

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研究

中国道思之我思

王树人(老树)

【提要】如果用义理的方式去追寻“道”，永远品不出“道”的真味，“道”有“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特点。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支撑和塑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以往被边缘化的非理性思维及其语言文字，例如中国的悟性象思维和汉语言文字，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受到世界的普遍重视。悟性之思如象思或道思，它在从无到有的超越性方面起着首要作用，而在具体完成这个“有”的创造过程中，则理性必须参加进来，两者共同协力完成“有”的创造。

【关键词】“道” 道思 象思维 悟性之思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5-0005-05

引言

有一种说法，叫“儒道互补”，如何互补？这要从对待现实的态度上看。儒家对现实是执著的态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对现实则是超越的态度：“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实际上，人生活在世界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必须的，缺一不可。首先，无论个人或民族或国家，都要面对现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很现实的。只有执著地抓住现实、改变现实，才能推进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改善。但是，如何改变现实？循规蹈矩地执著现实，能有效地改变现实吗？历史事实证明，即使有所改变也是极其缓慢的。从秦始皇开始的大一统极权专制统治，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社会发展被有的学者称为“超稳定”状态。就是说，太缺乏社会变革的超越精神。错过了西方的文艺复兴，错过了崇尚理性和科学的启蒙运动。对此，道家的超越精神，包括对现实和

文明异化的批判精神，确实非常宝贵，对于弥补儒家的不足有积极意义，值得研究。

1. 我觉得，如果用义理的方式去追寻“道”，永远品不出“道”的真味。庄子为什么提出“心斋”、“坐忘”？就因为，义理不是进达道的媒介和桥梁。相反，还是阻碍。从这里看出道与禅的相通点，两者都觉察出语言文字的局限，如禅之入门，就强调“不立文字”。虽然语言文字的发明很伟大，使得信息可以传播、交流和储存。但是，道、禅的传播、交流和储存，语言文字却显得苍白无力，还不如“高山流水”的古琴声。其实，音乐以声像传情，也是传道，而且能入心动魄。人走出野蛮、进入文明，最初就是靠集体的原始音乐和舞蹈。在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种舞蹈的形象。虽然听不见音乐，但可以想象。原始先民的音乐和舞蹈，可以说是人类后来一切文明的胚胎。这是因为，这种音乐和舞蹈直接与道或“天道”相通。正是蕴含在原始音乐舞

蹈中的道或“天道”，成为后来文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道具有原发创生性。正因为如此，能体道的人，心胸开阔，聪明，富于开悟的原创性，能见常人之不见，能解常人不能解之问题。

2.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道德经》开宗明义，就指出道不可诉诸语言论说。那么，如何通道呢？我在《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一书中，指出道不同于西方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有三个特点，即“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而实体性、对象性、现成性，恰恰是崇尚语言中心主义的概念思维的特性。并由此，我指出支撑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不是理性的概念思维，而是悟性的“象思维”。现在，我认为，也可以把这种象思维，看作体道的道性思维。从黑格尔到胡塞尔、海德格尔，都提出“面向（实际上是回归）事情本身”，力图追溯文化最后的真正支撑。但这个支撑是什么？在他们长篇大论中，有种种说法，但还不太清楚。倒是《圣经》指出：“太初有道”。但这个“太初有道”的“道”，翻译有问题。据说真意应当译为“太初有言”。可见，追溯到远古，就显示出中西文化的支撑之不同。西方强调语言论说的理性概念思维，中国则强调象的联想和超越的悟性象思维。

3. 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支撑和塑造了中西不同的文化。这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从基督教东传到中国开始，至今仍然在继续。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他认为，未来的文化冲突主要表现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与儒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之间，并将这种冲突绝对化，有明显的“西方文化优越论”色彩。文化冲突不可避免，但冲突并不是不可化解的。从中国化解与外来文化冲突的经验看，冲突并不是绝对的坏事，所谓“不打不相识”，通过碰撞，相互有所融合，能促进不同文化在融合中发展和创新。例如，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经过几次激烈冲突，终于在中国文化基础上与之融合而产生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佛教，如禅宗佛教等流派。这种新派佛教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影响深远，中国的文学如诗词，

艺术如书法、绘画等等，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都有所创新。禅宗经过日本禅师铃木大拙的英文著作传入西方后，也对西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如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读了禅宗英文译本后感到，他所提出的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其本质上所追求的，也许就是禅。

4. 进入21世纪，世界日趋多元化，文化的传播、交流、冲突也频繁发生。思维方式如何支撑和塑造文化的问题，思维方式交互冲突融合的问题，也日益显得重要。19世纪以来，伴随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到全世界，西方的文化及其思维方式也随之扩展到全世界，甚至成为占主流的强势文化，其思维方式也跟着强势起来。这就是所谓“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涵。

世界各民族因其语言文字不同，思维方式也不同，从而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在多元思维方式之间，先前由于交通、交流工具不发达，影响了相互之间的沟通与文化的融合。但是，现今随着交通、交流工具的日新月异，以往的隔阂都在日渐被打破，特别是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多元的语言文字及其思维方式之间，通过互相交流，也在互相借鉴而有所融合。西方中心论已经破产。以往被边缘化的非理性思维及其语言文字，例如中国的悟性象思维和汉语言文字，随着中国的崛起，正在受到世界的普遍重视。有人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这种变化，是不准确的。“西方中心论”的破产，并不意味“东方中心论”必然成立。

5. 具体思维，无论对于从事天地自然的研究者，还是对于从事社会人文的研究者，都是多元错综复杂的过程。绝非以往那种简单地从实践出发，先感性、由感性而上升到理性、再回到实践，就能解决问题。这种简单的、公式化的描述，把思维归结为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不用说忽略了重要的知性阶段，而且完全把最重要的非理性思维活动，如象的联想或悟性超越排斥在外。中国长时期的原创性缺失，有很多原因，就思维层面而言，就在于把自己传统中的思维宝贝——具有原发创生性的悟性的象思维简单否定了。在20世纪60年代，连浅层次

的“形象思维”，都被视为反马列主义而遭到批判。事实上，当理性被推到绝对至上之时，就走向反理性主义或理性杀人主义了，更遑论创造和创新了。

6. 实际上，一个致力于新发现和新创造的研究者，有时他即使调动“百思”，也往往不得其解。何况总陷入一种僵化的简单思维公式呢。所谓“百思”，如果在种种理性之思外，能突出非理性的悟性之思，则能事半功倍。因为，新发现和新创造的问题，单凭理性是无济于事的。理性能在推理分析综合中扩展知识，却往往不能发现和创生新知识。而只有能超越理性而又能超越自身的悟性，才能别具超出俗世和已有一切陈规的视野。这种悟性之思，其产生就是超越理性而又超越自身的结果。创造、创新的机制就在这种不断超越的思之活动中。

7. 超越，实际上是一种“道法自然”。在时空中的一切存在，都在流动转化中，也即处在不断变化或超越之中。德文的一个词语 Dasein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中，被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词语。海德格尔借这个词语描述人在世的存在境遇。Dasein 这个词语被翻译成不同的中文词语，曾经被翻译为“定在”。熊伟先生在翻译海德格尔著作时，将其翻译为“亲在”。后来张祥龙将其翻译为“缘在”。张祥龙与熊伟先生，认为“定在”没有把海德格尔赋予这个德文词语的张力翻译出来，他们的翻译属于一种意译。再后来孙周兴直译为“此在”。虽然“此在”似乎与“定在”有点类似，其实大不然也。Da，可以作为特定的“定”来理解。但是，在海德格尔著作中，Da 却绝不是特定的“定”，而是指具体时空的“此时此地”。而且，这个“此时此地”，不是定在“那里那时不动”。相反，“此时此地”的“在”，是在流动与转化之中，也可以说是在不断超越之中。正如海德格尔经常说的那样，人的具体存在境遇，从人出生之时起，就是“向死亡的存在”。海德格尔赋予 Dasein 的含义确实很深邃。这种深思与悟性象思或道思有相通之处，是一种动态的整体直观。

8. 人的生命诞生和成长直到最终死亡，这个过程乃是“道法自然”。对这个“道法自然”

过程的象思或道思，就是融于“大象”或融于“天道”。其思中“象的流动与转化”，归结为“超越”。就是说，人的生命存在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思的层面观之，思的运动既是上升的过程，同时也是下降或回归的过程。所谓上升就是随着知识和种种处世经验的积累而逐渐“成熟”（也逐渐衰老）。而所谓下降或回归，则是融于天道，如老子所说的“回归于婴儿”（也在一定程度上返老还童）。人如果能“返老还童”，“无疾而终”地走向死亡，就是“道法自然”而融于天道。思由知识增长和经验积累而超越之，才能使思融于天道，而变得视野开阔并提升到无限自由境遇，从而才能展现无限的创造和创新力量。

“超越”不是知识和经验所能给予的，相反，这些知识和经验有时还是横在超越路上的大山。每一次超越，都伴随一次或大或小的开悟。所以，要超越已有的知识和经验。如六祖慧能的引导，就是要进入“无念、无相、无住”的思之境界。开悟的超越，知识论是不起决定用的，需要的是“致虚守静”的功夫论。借用现象学的“悬置”表述，就是要把头脑中所有的知识和经验加以“悬置”，使其为超越让路。这是一种“致虚守静”的修行功夫，不是计算，也不是逻辑推理。

9. 所谓“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还在计算和逻辑推理的笼子里打转转。换一个与理性思维不同的思路，对于现代人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从理性之思转换到悟性之思，对于没有修行的人，就是如此。但是，若要创造与创新，则不同程度地，非有这种思之超越的转换不可。开悟而进入悟性之思，这里提出程度的问题。实际上，能够彻悟的人极少。就禅宗而言，皈依修行的人千千万万，但在历史上成为彻悟大师而传世的，凤毛麟角，屈指可数。

有一种说法：“悠闲出智慧”。这种说法的合理性在于，悠闲是指思能进入闲适自得状态，也就是能进入思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状态，也就是指思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常规、超越世俗的经验和理性的常规。这不就是一定程度的开悟吗？事实告诉我们，人若能做成一件有所

创新的事情，总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悟伴随，否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知，创新的大小，取决于开悟程度的大小。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虽然悟性与理性，都是人先天具有的。但是，两者开启和提高的途径，截然不同。理性的开启和提高，可以通过学习知识与积累经验逐渐达到。但是，满足于这种理性，或者说只追求这种理性，对于悟性的开启和提高，反而会成为一种压抑和障碍。悟性的开启和提高需要经过功夫论的修行，这种修行功夫，就是“悬置”理性的知识论和经验。从而能使得思进入悠闲的自由状态，或者如大乘佛教所说的“缘起性空”。大乘所谓“缘起性空”，基本意蕴相当于老子《道德经》所说的“有生于无”。现代人类所具有的一切科学、艺术等文化创造，不用说在原始先祖那里没有，直到现在，这些不断更新的文化产品，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作为人类思想领先的这一切文明创造，应当说，悟性之思如象思或道思，它在从无到有的超越性方面起着首要作用，而在具体完成这个“有”的创造过程中，则理性必须参加进来，两者共同协力完成“有”的创造。这两者的协力，在于悟性超越开辟的境遇，始终推动着理性变得灵动，使理性不是机械地按规则或经验习惯工作，而是能创造性地完成工作。就是说，悟性超越所开辟的新境遇，一直对参与进来的理性有所引导。最典型的例子，如中国画的创造。最关键的创造要求，就是“气韵生动”。何谓“气韵生动”？实际上就是道家所说的“道法自然”和“道通为一”。“气韵”就是中国画的画之“道”。也是“道可道，非常道”。但体道得道的画家，总是“气韵”在胸。其手中的画笔运行，无论“经营位置”，还是按“皴擦点染”这些理性的规则走笔，其所为，都从属于“气韵”，实质上也即都在画笔运行中体道。

10. “道”不是现成的可对象化的实体，因此不能作为任何知识论的东西，不可以作为主客二元的对象加以认识。所以对于“道”，我提出了“体道”。如何领会“体道”？这不是一个能说清楚明白的问题。但是，前文已经有所引领的提示，如老子说的“致虚极，守静笃”，

庄子说的“心斋”、“坐忘”，大乘所提示的“缘起性空”，六组慧能所说的“无念、无相、无住”。这些都不是认知学习的途径，而是修行的引导。这种修行引导，根本就在于把世俗经验与理性的概念和规则从头脑中排除，或者用现象学的术语“悬置”起来。这种“排除”和“悬置”，对于常人特别是现代人，非常困难。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也需要很长时间、下大功夫。

理性的知识论在现代人的头脑中，已经成为顽固的习惯。以至于，许多研究者对于道家道教的经典，虽然烂熟于心，能倒背如流，但是，由于他们总把“道”看成通常的理性概念术语，作主客二元的对象化研究，所以他们所说所论之道，与道家、佛家、儒家所说的“道”或“天道”多不相干。这种把“道”当作理性概念加以对象化的分析，如同海德格尔批判西方学界长期把“存在”当做“存在者”的误解，有些类似。

道不可以对象化，因为道的动态整体性，表现为道在道的大化流行的生生不已中，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可见，如果把道对象化，就是使在道中的研究者自外于道。这只能歪曲道。所以，为了不歪曲道，就只能进入道中，“与道为一”或“道通为一”而“体道”。具体的生灭现象不过是，生者生于道，灭者回归于道。一切存在物，都能在大道流行中永生。

11. 体道的修炼，既有庙、观之内的神职修行，又有庙、观之外的非神职修行。前者遵师父的指引以体道，后者则多为自修以体道。因为，体道的法门指引，如前述“致虚守静”等等，在中国种种功夫中已经流传至今，也已得到证悟。当然，在修行中有师父指引最好，可以防止走偏。但只要循序渐进，不急于求成，则都会功到而自然有所成。

实际上，既然人与万物都天然地处于道的大化流行中，则也会有无意识的体道修行。如人在工作疲倦时，进入闭目养神状态；酒后小酣入梦；在旷野林海中穿行，感受到大自然与自己浑然一体，也皆是在放松中有所体道。不少艺术家在书画等艺术的长久习练中，无意中有所体道，感到心手双畅，有人甚至感到似乎

有外力推动自己的手。此外，自然科学家，也能在放松的休憩中有所体道，焕发出创新的灵感，以至于有新的发现和发明。至于文学家和诗人在无意放松中偶然得道，突发奇思妙想，更是比比皆是。

事实说明，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只要不忘“致虚守静”，也能不同程度地体道而得道，从而有助于工作和生活的创新改变。当精神高度集中在某一件事情上时，这种精神集中，实际上也就“悬置”了一切其他的思想观念和世俗的经验，甚至达到“忘我”境界，而能通于道，从而能推动创新思路的开启。老子所谓“道之为物”，就是说天地之间存在的一切，都在“道”中。当打破主客二元，原来的工作对象已经与工作者一体相通，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具有“道通为一”的意味。再说，既然道无所不在，那么，在生活工作中，道也在其中。因此，在生活工作中，也可体道。一位修行的朋友，曾经对我说，他的生活和工作，从没有影响他体道练功。他甚至说，就在和我交谈时，他的体道练功也在进行。由于有他这种提示，我也在琢磨，也在尝试，感到确有所得。由此，我联想到禅宗经典《五灯会元》中反复提示，

何谓参禅？就是参禅者做事情，无论吃饭、睡觉、担水、劈柴，等等，都要专一。吃饭就是吃饭，睡觉就是睡觉，此外一切事都不思不想。用现象学术语说，就是专一而“悬置”其他一切。这样，就可能参禅入禅道了。可知禅师引导徒弟入禅门的初始法门，也是从日常生活入手的。专一做事，不做任何旁顾和思虑，也就是一种体道。这就是禅宗倡导的“平常心”，所谓“平常心是道”。这也与老子“道常无名，朴”是一致相通的。这种“平常心”，看似简单容易，但对于禅外之人，其实非常之难。对于世俗的现代人，无论什么行当，包括家庭聚餐吃饭，不用说不思虑，就是不说话也难。相反，聚餐吃饭恰恰是闲谈甚至谈论事情的场合。独居者，一个人吃饭，没有交谈的对象，不说话没有问题，但是不思不想，也不可能。可见，禅外之人，单就吃饭就是吃饭而言，不说话不思虑，就难以做到，更遑论其他了。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
责任编辑：周勤勤

Some Thoughts on the Chinese *Dao* Thinking

Wang Shuren

Abstract: Limited to the rational and analyzing patterns of thinking, one can never understand the true meaning of *Dao* (道). *Dao* cannot be approached solely through reasoning. *Dao* is a Chinese thought characterized by non-substantiality, non-objectivity and non-vorhandenheit. The different thinking patterns betwee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estern philosophy contribute to the shaping of their cultural differences. Since the west centrism has collapsed, the languages and thinking patterns, which have been ignored in the circle of western mainstream cultures, are gain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long with the rise of China,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its characters and the intuitive Chinese thinking (*Xiang* thinking) pattern are becoming significant issues for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s. Both *Xiang* (象) thinking and *Dao* thinking are intuitive thinking pattern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cendental process from not-being to being. During this creative process of the being, reason must work together with *Xiang* thinking.

Keywords: *Dao*; *Dao* thinking; *Xiang* thinking; intuitive thinking